

# 忆文革串联

燕南 2022.4.6

对我来说，文革的一个“亮点”是可以串联，而且是免费的。第一次去北京的串联是“组织”安排的。那时，我们福建教育学院“革命群众”刚刚到五一广场参加了一次由福建省委召集的大会。省委书记叶飞亲自到场主持，并邀请北京来的红卫兵上台讲话。而后，教育学校开全体大会，宣布需要挑选革命群众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并学习怎样开展文革。我们人是选出来了，但什么时候动身却是一个秘密，因为我们这些“组织”安排的人显然属于保守派，而社会上此时已经有造反派争着要上北京了。我们近 20 人（右边照片）带行李被接到一个学校住。半夜传出要走了，转了一圈又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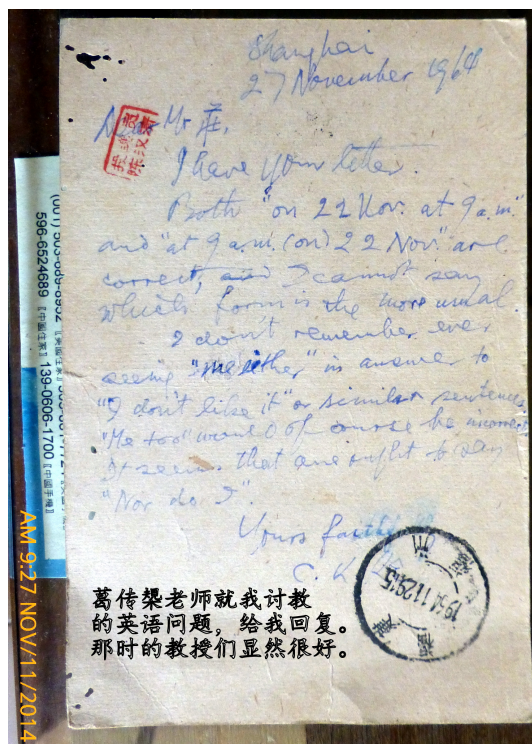
隔日，又宣布行动，这回真正上了火车。

火车上很挤，但我们都有座位。晚上睡觉时，我是躺在座位下，在同事们的脚下睡觉。到济州时，吃到路旁卖的济州烧鸡，实在好吃极了。火车到了天津，我们受命拿了一堆铅印的传单，从天台上往下撒。到了北京，我们成了“毛主席邀请的客人”，分配到地质部的机关大院。他们把他们部里的电视机拿出来供我们观看。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电视机（当然，是黑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在 3 个多月时间里先后 8 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我们的是 10 月份，应该是第五次。我的弟弟也在同一时候来到北京。他随他们学校（龙海一中）来，随他们学校回去。右上图是我们和我们在北京的表姐弟相会和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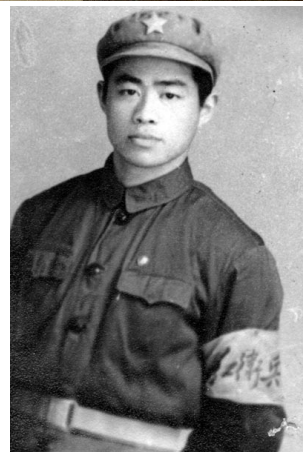


回到福州，教育学院来了工作组，由福建省教育厅一个副厅长带队，但相当低调。我又

想出去串联了，就写报告给工作组，副厅长批准了。这下我是独自串联，去哪里，做什么，都是自己决定。我第一步去杭州，坐船玩了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然后，转去苏州，在那里吃到用大锅大铲炒的核桃。然后去上海。上海是我心仪很久的地方，但以前没机会也没钱去玩。在上海时，我去了复旦大学，那里的外文系的葛传槩是我敬仰多年的老师。他的《英语惯用法词典》我翻遍了每一页。我有问题问他，他也都亲笔答复（右图）。我问了外文系的学生，说老先生情况尚好。在上海，我第一次看到有大字报说刘少奇是走资派。我不是党员，但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买了并看得很认真的。也第一次碰见造反派在攻打大学的档案室。当守卫档案室的红卫兵高声呼吁旁观的革命群众加入档案室保卫战时，戴“东海前线红卫兵”臂章的我（右下图），曾经有爬上墙头去参战的冲动。那年（1966年）我25岁，没有成家，但有妈妈。想到妈妈，想到妈妈会为我受伤或死亡而悲伤，我就没有挺身而出。为了妈妈，我以后也没有参加任何武斗或会损害父母之体肤的事。在上海，我去了位于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商店，到文件柜买了不少高质量的纸张。从上海，可以乘火车上北京，也可以乘大海轮到大连。我选择了大连，因为它是表兄弟甘云鹏毕业的地方（大连海运学院），也因为这座海滨城市有俄罗斯景色。从上海去大连的海轮是军用的或民用的我忘记了。记得在公海时空中来了飞机，船员们连忙让人们下船舱躲避。夜间很冷，船员们还发毛毯给我们。第二天要到岸了，听说发出去的毛毯少了一件。我很吃惊，因为这是跟革命年代很不相容的行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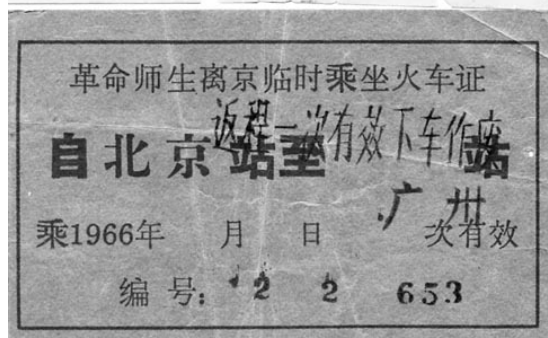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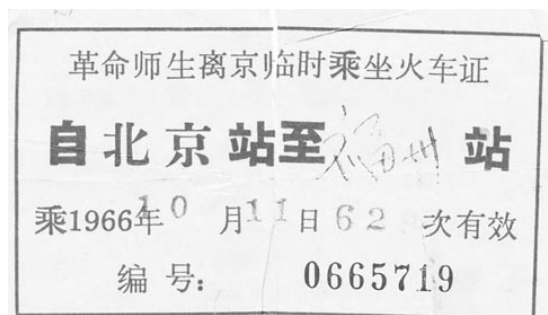


葛传槩老师就我讨教的英语问题，给我答复。那时的教授们显然很好。



然后，从大连到北京。这次住一间中学，住大教书。十几人通铺，有臭虫爬上身。又参加了毛主席的天安门检阅，是11月25日的第八次（最后一次）。此后，要离京的师生只能够回原学校了。我用我的“东海前线红卫兵”红卫兵证顺利拿到12月2日去广州的火车票。广州也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特别是那里有我心仪的人。右图是我两次离开北京的免费的火车票。

在广州，我去看了我心仪的人，还去了黄花岗烈士陵园。一两个星期后，我拿了从广州回漳州的汽车票。我回到石码，并在家乡住



了近一年，因为这时“全面内战”开始了。直到全国武斗基本结束，我才回校。

如今记得文革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既然我尚记得，又有时间写，就作为回忆，留给自己吧。

另见：<https://yannan.us/growup/fuzhou/broadcast/broadcast.htm> （省级机关干部生涯）